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关于财富的形成 和分配的考察

[法] 杜尔哥 / 著 唐日松 / 译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iches*

華夏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关于财富的形成 和分配的考察

[法] 杜尔哥 / 著 唐日松 / 译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iches*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法)杜尔哥著;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082-0

I. 关… II. ①杜… ②唐… III. 重农学派 IV.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459 号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法]杜尔哥 著

唐日松 译

策 划:于泽俊 陈小兰

责任编辑:李雪飞

出 版 者: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8.5

字 数:69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 1882 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 H. 福西特（1833 ~ 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 年）中译本] 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的，呈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

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 年 11 月 15 日

中译本导读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 ~ 1781), 法国政治家, 重农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尔哥 1727 年生于贵族家庭, 早期从事教会工作。1752 年任代理检察长。1753 年任衡平法院裁判长。1761 ~ 1774 年任州长, 主张整顿税制和废除徭役, 由此声誉鹊起。1774 年路易十六任命杜尔哥为财政大臣。杜尔哥提出的纲领是: “不破产, 不增税, 不借款”。他主张谷物自由买卖, 废除行会会长和师傅, 简化税制, 归并各种赋税为单一的土地税, 贵族等特权阶级也须纳税。1776 年 1 月, 杜尔哥提出六条改革法令, 遭到贵族和行会的反对, 同年 5 月被解职, 后专心从事著述。

杜尔哥在经济思想上发展了魁奈所创立的重农主义

体系。重农主义学派是继重商主义后法国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该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到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而结束。

重农学派创立了自然秩序的理论。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人类社会如果按照自然秩序行事，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反之，社会则处于非健康状态，便会变得动荡不安。他们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实现这种自然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经济生活不要加以干预，而要实行自由放任。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其为基础。重农学派认为，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种子及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之外还有盈余。重农学派称这种盈余为“纯产品”。他们认为，在农业中，“自然界”虽参与农业生产过程但却不要求任何补偿，所以“纯产品”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魁奈把“纯产品”归结为由农业劳动生产者所创造，只有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他的纯产品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萌芽。但魁奈只从使用价

值的角度把握农业中产生的“纯产品”，只研究了剩余价值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即地租，他还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

重农学派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虽然重农学派对社会阶级结构分析有严重错误，但他們是最早把社会分为阶级，并试图以此分析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在杜尔哥的著作中得到最高的发展。他进一步阐述了重农主义关于“自然秩序”、“自由放任”和“纯产品”等学说。他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农业是惟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创造新财富。杜尔哥仍然认为“纯产品”是“自然界的赐予”，但他强调这是土地对于农业劳动者的赐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超过他们的劳动工资，这实际上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纯产品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他更明确地说明了“纯产品”是由农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而为地主所占有，从而比魁奈更为正确地理解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

杜尔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更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在魁奈提出的三阶级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出了雇工和资本家阶级，并初步表述了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历史过程。杜尔哥认为，资本家是通过垫付资本从而使用别人的劳动而获得利润的。他还正

确地认识到雇佣工人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工人因失去生产资料因而一无所有，便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工资的价格像其他商品一样是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工人的工资仅限于维持其生计所必需的东西。

杜尔哥明确了生产要素有三：土地、劳动和资本，因而其收入也有三种形态：地租、工资和利润。在杜尔哥看来，资本就是货币资本。由于生产在不停地周转，人们不仅需要货币资本，而且也需要原始的生产要素资本。杜尔哥认为，货币资本是经济活动中一切部门所必需的。他将资本定义为“积累的可动财富（价值）”。如果考虑到资本包含着不同程度的风险，那么，各种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使得一切可能的投资报酬率趋于相同。为了使生产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需要使得各种投资得到一些报酬；如果报酬率下降了，资本就会被抽走，生产就不能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杜尔哥的税收思想主要体现在平等课税以及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较方面。关于关税，他认为，国家干预的保护关税会加重本国人民的负担，并会招致对方出口国家的报复，使双方贸易均受损失，应以平等关税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由竞争。关于国内纳税，他认为，应废除贵族、僧侣、大地主等的免税特权，实现国民平等纳税。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他认为应从土地纯收入上直接

征税。

杜尔哥的经济理论体系无疑是近代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雏形。最早将“资本”一词从日常用语转变为经济学术语的就是杜尔哥。尽管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基本问题研究得很不充分，对工业、对外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重要理论问题并不重视，甚至还没有涉及，但杜尔哥的经济理论代表了新兴的产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力图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商业资本的各种垄断。他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纲领。他所实施的这些措施在他离职后虽然被取消，但后来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机构予以恢复并执行。马克思称他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本家阶级大臣”，“试图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

我们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是，杜尔哥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十分倾慕中国成熟的农业管理，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并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农业管理经验。所以，当两名来自中国的留法学生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使他们再留一年。其代表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1766)，就是为这两名中国留法学生而写的。此书成为中国留学生撰著的《中国问题集》的“总序”。《中国问题集》包括杜尔哥向他们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的共五十二个问题，是让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解答，以便让法国人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的资料。《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就是为了使中国学生理解上述问题而写的。杜尔哥正是在这本书中概述了重农学派的理论，并将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最高峰。

唐日松

2006年8月于沈阳

英译本序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奥利男爵，1727年5月10日生于巴黎。他是诺曼底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后裔，这个家庭曾有两三代人是国家有才干的行政官员：他的祖父曾任州长；他的父亲曾任司法高官，并一度作为行会会长主持巴黎市政工作。杜尔哥本人在路易学院和布勒西学院接受早期教育，后来，由于作为幼子注定要从事教会工作，他便进入圣沙尔比斯神学院学习神学，并于1747年获神学学士学位。1748年，他获准进入索尔滂恩修道院，1749年12月，当选为1750年的名誉副院长。1751年初，他改变计划，决定从事司法和行政工作。1752年1月，他被任命为代理检察长；同年12月，任巴黎市议会参议员；1753年3月，任衡平法院裁判长。在随后的8年，他的职务

主要在司法方面。不过在 1755 ~ 1756 年间，他随同商务督察古尔内巡视了法国的南部和西部。

1761 年 8 月，杜尔哥被任命为利摩日州州长，一直任职到 1774 年年中。在任职期间，他改革了丁税的征收方法，以货币缴税的方式代替了徭役制的强迫劳动，在本州境内允许谷物自由流通，并建立了一种济贫制度。在他偶然一次的访问巴黎期间，与大卫·休谟（1763 ~ 1766 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建立起了友谊，并结识了亚当·斯密（1765 年圣诞节至 1766 年 10 月在巴黎）。就是在 1766 年，杜尔哥完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详见下文）。

路易十六即位后，杜尔哥应邀进入新内阁。在海军部的短暂任职（1774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后，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任财政大臣短短两年间的政绩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他实施的最重要措施是：建立国内谷物自由贸易；以各特权阶级也要缴纳的赋税代替徭役制度；取消手工业同业公会。杜尔哥的政令引起贵族、官员及所有愿意维持现状的人的最坚决反对。路易十六听从了朝臣以及皇后玛丽·安托瓦妮特的谏言，于 1776 年 5 月 12 日罢免了杜尔哥的职务，他所实施的各项措施随即也被取消。后来这些措施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机构予以恢复并执行。杜尔哥退职以后全力致力于著述，直到于 1781

年3月18日去世。

杜尔哥生前所发表的经济著作，除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之外，似乎只有1755年所著的《关于商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书名译自塔克的英译本），以及1756年《百科全书》所载的《市集与市场》和《基金》这两篇论文。然而，他撰写过大量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有些是他呈送上司的关于利摩日州治理情况的报告；他向公众发布的传单以及其他文告，用来说明并阐述他在利摩日州长任期内所实施的改革措施的理由；他在任财政大臣期间所颁布的各项政令。所有这些文献，连同他于1759年所著的《古尔内颂》，都由杜邦·德·奈木尔编入《杜尔哥文集》（共9卷，1809~1811年陆续出版）。1844年，德尔和杜萨增订了这部《杜尔哥文集》，以两卷本的形式作为吉劳敏主编的《主要经济学家著作集》的一部分再版发行。《经济学微型丛书》中有1889年米·罗宾诺编辑的一卷，卷名为：《杜尔哥：政绩和经济论文》，其中包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古尔内颂》、《废除徭役制度》以及《取消手工业同业公会的公告》。在沃克·史蒂芬斯所著的《杜尔哥的生平和著作》（1895年出版）中，我们可找到《古尔内颂》和对杜尔哥著作许多方面摘要的译文。

杜尔哥传记的主要来源是杜邦·德·奈木尔所著的

《关于杜尔哥的生平及其著作》(1782年出版)。杜尔哥的朋友康多塞于1786年所著的《杜尔哥的一生》(1787年译为英文)提供了部分额外细节。在《政治学小辞典》第六卷由利佩特博士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杜尔哥有关的作品目录。其中最著名的(因作者身份显赫而著名)有:里昂斯·德·拉维尼1870年在《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上发表的论文;约翰·摩莱1877年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里昂·萨伊于1887年所著的杜尔哥传记。这本传记由古斯塔夫·马森于1888年译为英文。在极少数真正公正评价杜尔哥在法国历史上地位的著作中,读者可参见米·艾伯特·索雷耳所著的《欧洲与法国大革命》(1885年出版)第一卷,第209~213页。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本书是杜尔哥1766年底为两位中国青年而写的。这两位中国青年一直在法国求学,当时得到皇家资助正要返回祖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中国是少有的开明统治之国(参见德·托克维尔的《旧政体》,第三卷,第3章)。人们期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让他们的欧洲资助人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尔哥为他们列出了须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并写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本书,以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参见本书附录中的摘录(六)]。1769年,他

同意了杜邦·德·奈木尔的一再请求，把这本书交给他在杂志上连续发表。当时杜邦正主编重农学派的学刊《公民评论》，经常缺乏稿件。杜尔哥的作品发表于《公民评论》1769年第11期和第12期以及1770年的第1期。不过，实际上直到1770年1月、2月和4月才发行。

米·格·谢尔最近指出（参见他的《杜邦·德·奈木尔和重农学派》，1888年版，第126~129页），以及他为《经济学家学报》1887年7月刊所写的一篇文章），杜邦没有征询杜尔哥的意见，就自作主张不止一处地修改了他的原作。在第十七节，他把“人类习俗”和“民法”这两个词前面的“人类”和“民”都删掉了，并且在“他们不再耕种土地”这句话后面加上“这是作为原始农业所垫付的代价，由此他们使这些土地能由人们耕种，这笔垫付可以说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了”。杜邦还把杜尔哥原著中关于由奴隶耕种土地的那一节（第二十一节）改为了三节；他增添的部分（比杜尔哥原稿更长）不仅强调奴隶制的道德罪恶，还认为奴隶劳动甚至对奴隶主也无利可图。在原著第五十五节的标题和开头几句中，杜邦把奴隶属于可动财富这个观点完全删掉了。杜尔哥对此极为恼怒〔参见本书附录中摘录（七）和摘录（八）〕，他坚决抗议杜邦擅自修改第3期的原稿。但杜邦不肯不加批判地刊